读史札记

《万国史记》在清末中国的传播和影响

王艳娟

世界历史知识在中国传统史籍中早有记载，但诸多因素从不同侧面、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世界历史融入中国知识体系，外朝外邦的历史只是作为中原王朝史的补充，始终处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边缘。鸦片战争后，世界历史知识的传入与研究逐渐拓展开来，大量世界历史书籍的中译本纷纷刊印，广为流传，源源不断地激荡着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陈陈相因。关于世界历史书籍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学校教育，史学界也已进行了一定的考察。本文做进一步的深化和展开，以当时广为流传的日本人冈本监辅所著的《万国史记》为例，探析世界历史知识传入清末中国知识界的主渠道、传播路径及其影响。

一、世界历史知识的来源与译介渠道

鸦片战争爆发后，英国的大炮“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”。①在“经世”、“致用”思潮的推动下，为救亡图存，解决千古未有之大变局，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有识之士“对外求索之欲日炽”，“欲破壁以自拔”，②遂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世界历史知识。晚清国人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来源主要有：

（一）开明士人搜集编著的世界史著述

19 世纪中期，晚清出现了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历史的著述。据统计，从 1840 年到 1861 年止，至少出现了 22 种有关外国历史方面的著作。③林则徐的《四洲志》中介绍世界各国历史与现状的部分，是根据英国人慕瑞著《世界地理大全》所译；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百卷本是在《四洲志》基础上，征引历代史志，及中外古今各家著述而作，尤其注意征引外国人的直接记载，“以西洋人谭西洋”④。徐继畬撰写《瀛寰志略》时，访谈美国传教士和在厦门英国领事，并广泛搜集和阅读外国地图和西方人士的汉文书籍，“有刻本，有钞本，并月报、新闻纸之类，约数十种”⑤。与道光咸丰年间的林则徐、魏源、徐继畬等人相比，同光时期的士子开眼看世界的视野更为广阔。王韬的《法国志略》《普法战纪》、黄遵宪的《日本国志》相继出版。丁日昌曾组织人翻译《六大洲图说》一百卷，还翻译了各国史事百家及笔记丛谈。此外，黄遵宪曾经准备

［收稿日期］2016－02－10
［作者简介］王艳娟（1979－），女，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，杭州 310018；yanjuan3344@163.com
［基金项目］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（12JCLS08YB）；浙江理工大学科研攀登计划（13136067-Y）资助成果。

① 马克思、恩格斯：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（第一卷），人民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2 页。
② 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59 页。
③ 费正清：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（下）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176 页。
④ 魏源：《魏源集》（上），中华书局，1983 年，第 207 页。
⑤ 徐继畬：《瀛寰志略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 年，凡例部分。

编著一部世界历史著作，制定了写作提纲，搜集了不少材料，准备写列国传十卷、志十二，后来“积稿压架，东西驱驰，卒未成书”。① 王韬曾经计划编撰 120 卷的《四溟补乘》作为《海国图志》的现代版，“搜罗宏备，详于近而略于远，于近四十年来所有国政民情朝聘盟会和战史更革诸大端，无不一一备载”,② 可惜没有正式出版。

（二）在华传教士编译出版的书籍、报刊

鸦片战争后，欧美传教士所办书刊的出版地从南洋、广州、澳门一带扩展到了中国沿海很多城市，并逐步拓展到内陆城市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发行网络。③ 1860 年，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达到了 32 家，1890 年又增加到 76 家。④ 西方传教士充当世界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主体，其相关编译活动在甲午之后达到了高峰。出版世界历史书籍最多的是广学会。从 1905 年的《广学会书目》看，其出版的 258 种图书中，世界历史类书籍有近 60 种，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强，涉及了世界历史、国别史、政治史、战争史、社会风俗史、宗教史、人物传记等。⑤

甲午之前，中国主要是通过欧美渠道译介世界历史，整体而言世界历史的编译尚未成风气，当时流传的有关世界历史的书籍还非常有限。戊戌之后，维新人士、辛亥革命派掀起了通过日本渠道译介世界历史的热潮，这显然与甲午战后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改观有关。⑥ 至 1911 年，留日生已创办了 30 余种刊物，转译日本史书，也十分引人注目。⑦ 各种报刊专栏也刊载了很多汉译的世界历史著作及日人史著。据统计，仅日文汉译世界历史著作在 1896—1911 年间就达到了 175 种，而在 1660—1895 年间只有 2 种。⑧

二、《万国史记》在清末中国的传入与传播

甲午战败的耻辱和随之而来的瓜分危局，使越来越多的国人反省对世界形势的无知，认识到“鉴于远古，不若鉴于近今”⑨，“欲生存于今日，必不可无世界知识，而欲有世界知识，要非读西史不为功”⑩。世界历史书籍，成为人们了解世界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资源。正是基于此种动机和社会背景下，《万国史记》传入中国。

《万国史记》为日本人冈本监辅所著，1879 年出版。成书背景是明治维新后，各地学校普遍缺乏介绍世界各国历史的教科书。由此，汉学家冈本监辅认为，“方今急务，在审万国形势”，遂有志修史。冈本监辅搜辑近人译书，利用当时日本国内的许多西方世界史的日译本，摘录其要，用汉文写成《万国史记》。它是近代日本第一部以汉文编纂的世界史，当时政界、文化界名人纷纷为之作序，给予冈本监辅和《万国史记》极高的评价。⑪

《万国史记》突破了中国传统儒家的天下世界观和华夷之辨观念，该书在序言即明确批评了睁眼看世界的魏源著书《海国图志》，“自称曰中土，是井蛙之见耳”。受过近代西方“世界历

---

① 黄遵宪：《〈送佐田少警视使于欧洲序〉批》，收入《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197 页。

② 柯文著，雷颐等译：《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——王韬与晚清革命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 106 页。

③ 赵晓兰：《19 世纪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历史演变及其近代化进程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08 年第 1 期。

④ 方汉奇：《中国近代报刊史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1 年，第 10、19 页。

⑤ 胡逢祥、张文建：《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156 页。

⑥ 彭雷霆：《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（1871—1915 年）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3 年。

⑦ 李喜所：《清末留日学生的译书》，收入《中国留学史论稿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 年。

⑧ 谭汝谦：《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80 年，第 48 页。

⑨ 康有为：《进呈突厥削弱记序》，收入《康有为政论集》（上），中华书局，1981 年，第 298 页。

⑩ 本多浅治郎：《高等西洋历史教科书》，熊钟麟译，东京导文社，1909 年，序言部分。

⑪ 刘雅军：《明治时代日本人的世界历史观念》，《历史教学》2005 年第 12 期。

史”观念的影响，冈本监辅并没有按照传统日本史书的纪传体或编年体、纪事本末体等体裁，而是借鉴西洋史学的综合史观的叙述体例，分上古、中古、近古三个阶段，使用国别体概述了亚欧美洲主要国家的历史，叙述顺序是先亚洲，次非洲，次欧洲，再次是美洲，最后是太平洋群岛，重点介绍了各国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概要。在每篇文章末尾，冈本监辅以“论曰”起头，发表自己的简短评论。

按照冈本监辅自己的说法，《万国史记》是以“天下之士记天下之事”的立场和方法，力求总体叙述世界历史。冈本监辅认为，世界历史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，各国历史只有置于其中，才能客观分析，扬长补短。《万国史记》将日本历史置于各国之首，强调要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反思日本的治乱兴衰，希望能够客观评价日本的历史，启发日本的未来。以世界历史反思国史长短的《万国历史》，正好契合了甲午之后中国维新派人士救亡图存、变法革新的政治诉求。

由于《万国史记》一书继承了日本史学用汉文编写史书的这一传统形式，消除了外国史书传入中国的语言文字障碍，而且该书又是东亚国家自己编写的世界历史著述，诸多因素一起推动了《万国史记》在日本、中国的广为流传。

对于《万国史记》传入中国的时间，中国史学界说法不一，基本上分两种观点。第一种观点认为，《万国史记》成书之后即已传入中国。马祖毅《中国翻译史（上卷）》说：“甲午之前，曾于1878年出版过中村正直选、冈本监辅合译的汉文《万国史记》。”① 邹振环认为，1878年《万国史记》传入中国。② 笔者认为，《万国史记》虽在1878年脱稿，但又经多人校改，直至1879年才定稿刊印。此种认为在1878年就传入中国的说法不合时间逻辑。

第二种观点认为，《万国史记》是甲午战争之后传入中国的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，冈本监辅的十册《万国史记》是1895年在中国重刊的。③ 姜义华认为，《万国史记》以及其他类似的翻译著作，形成了“近代中国介绍世界通史的第一个高潮”。④ 马金科的《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》也认为“日人冈本监辅著《万国史记》，由程世爵译，1898年出版”。⑤ 另外，张佩国认为《万国史记》是1897年在中国刻印的。⑥ 此外，还有类似的观点。⑦

《万国史记》究竟何时流入中国，本文无意做具体考证。但在戊戌维新时期，《万国史记》确已传入中国，并多次刊印，广为流传。《万国史记》有多种翻刻本，既有日本原版本，也有中国出版机构自己翻刻的版本。最早由申报馆1880年翻刻，后多次再版。此外，至少还有六家出版社翻刻过《万国史记》，其他版本的印刷次数无法统计了。由于当时没有完善的数字统计，各个版本的印刷、销售数量，难以确切弄清。按照时间顺序，列举如下：

《万国史记》在中国除了以整本书翻刻出版外，还收录进晚清人编写的多种丛书。晚清较为流行的世界历史书籍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、《万国总说》和《法国志略》等，都有部分内容采自冈本监辅的《万国史记》。1899年，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首次来华，在其中国游记《燕山楚水》中提到，他与天津育才堂教习蒋国亮谈话时，蒋国亮提到：“贵国书籍，译成中文，此乃大有益处之事，以此开启中国文明，与贵国又有益处。近日有《万国史记》、《中国通史》，中

---

① 马祖毅：《中国翻译史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577页。

② 邹振环：《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》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，1996年，第87页。

③ 实藤惠秀著，谭汝谦等译：《中国人留学日本史》，三联书店，1983年，第209—210页。

④ 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》（《世界历史》篇）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64页。

⑤ 马金科：《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（1840—1949）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124页。

⑥ 张佩国：《晚清史学的文化视野》，《史学理论研究》1997年第1期。

⑦ 周建高：《〈万国史记〉传入中国考〉》，收入《日本研究论集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278页。

国人买此书者甚多。”① 足见《万国史记》在当时流行。

《万国史记》在清末中国流传的数种版本②

日本 原版本		1879	线装本 20 卷，装订为 10 册，每册 2 卷。
中国 翻刻本	申报馆聚珍版	1880	线装本，8 册。
	上海读有用书斋版	1895	
	上海六先书局铅印版	1897	线装本，8 册，是翻刻粗糙的一种版本。
	上海著易堂版石印本	1898	线装本，6 册，是唯一有地球图的版本。
	上海书局石印版	1901	线装本，6 册，是较粗糙的一种刻本。
	两宜斋石印版	1901	线装，10 册。

三、《万国史记》对清末知识界的影响

《万国史记》的畅销扩大了冈本监辅的知名度和《万国史记》的影响力。大量的维新志士和青年学子正是通过阅读《万国史记》，了解世界历史和世界形势的。

清末学者对《万国史记》既有赞赏，也对该书的体例、史观提出了批评的。最先接触到《万国史记》的是中国驻日使员和旅日的中国学者。1879 年，王韬的《扶桑游记》称，《万国史记》搜罗颇广，“固必传之巨制，不朽之盛业也”，“有志于泰西掌故者，不可不观”，③ 成为王韬写作《法国志略》初稿的重要参考资料。此时的驻日外交人员何如璋、黄遵宪等都与冈本监辅相识，在《万国史记》出版的第一时间读到此书。何如璋欣赏《万国史记》，觉得美中不足的是该书“杂采西史，漫无别择”，特别是对于中国部分的论述，“词多鄙陋，不足取信”。黄遵宪在 1880 年认为此书是第一部汉文欧美史，编辑宏富，“书综纪万国，序上称三古，可谓一纵一横，论者莫当”，同时又说，“余恨其无《志》、无《表》，不足考治乱兴衰之大者”。④ 1887 年，宋恕在上海见到日本传入的《尊攘纪事》、《观光纪游》、《万国史记》三书，称“冈本氏（冈本监辅）之最先引我入胜也”，并认为《万国史记》远胜《海国图志》、《瀛寰志略》。⑤ 宋恕对该书的体裁也颇有微词，“《万国史记》冠日本于万国之上，自以至公，然其体例实未为得。盖学者习史，外国不能不略，本国不可不详；若撰史者平列本国于外国，取齐篇峡，势不能详”。⑥ 由此看来，何如璋、黄遵宪、宋恕等人都以传统史书的叙事体例来评价《万国史记》，认为此书是关于“列国史”或“泰西史”的故事汇编，而没有认识到《万国史记》的编写已经受到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影响。尽管如此，黄遵宪受此影响于 1887 年完稿的《日本国志》，仍然采用了国别史的编写体例。郑观应的《盛世危言》成书于 1894 年，称看过《万国史记》，认为泰西古昔君王穷兵黩武、四处征战、弱肉强食的史事仍在延续，“盖天地之杀机至今日而尤酷尤烈矣”，

① 《内藤湖南全集》第二卷，筑摩书房 1946 年版，转引自钟放《清末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学》一文，收入《日本研究论集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404 页。

② 表格数据参考王勇著《“和刻本”与“华刻本”》一文，收入《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研究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3 年。

③ 王韬：《扶桑游记》卷中，收入钟叔河主编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1985 年，第 463 页。

④ 黄遵宪：《〈送佐田少警视使于欧洲序〉批》，收入《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197 页。

⑤ 宋恕：《宋恕集》上，中华书局，1993 年，第 294 页。

⑥ 江子云：《万国历史汇编》，上海官书局印，1903 年，第 63 页。

顿生危机感，慨叹而发出“盛世危言”。①

《万国史记》在进入新式学堂教育后，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历史知识在清末中国知识界的普遍传播，推动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结构变革。甲午之前，流行的世界历史书籍，“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”②，开设世界历史科目的学堂或书院寥寥无几，合适的世界历史教材也异常缺乏。③《万国史记》因其书简要，便于翻阅，成为新式学堂必读的世界历史书籍。

康有为的长兴学舍（万木草堂前身）的教习课程，有“万国史学”一项，注重传播关于世界的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语言等方面知识，梁启超在长兴学舍就读期间就曾读过《万国史记》，其读书心得《读书分月课程》曾言，“读西书，先读《万国史记》以知其沿革”。梁启超为长沙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期间，开设中外史志课程，把《万国史记》列入普通学之内。同时期的天津育才馆的十门功课中，史学占了三门，中外史学的书目即是《万国史记》、《泰西新史揽要》等。1896 年，梁启超向清末知识界推荐西书而写作《西学书目表》，发表于《时务报》。在《史学书目提要》以及《东西学书录》都把《万国史记》列于第一位，将其视为西学入门书的圭臬。

及至戊戌变法期间，清廷诏令开办大、中、小学堂，强调“新旧兼学”，增设史地学科，科举改试策论，考中外历史。为适应科考需要，从京师到地方，从沿海到内地各地学堂、书院，如天津中西学堂、广州时敏学堂、南洋公学、山东大学堂、浏阳算学馆、两湖书院、江西省城书院、江阴南菁书院、河南大梁书院等，都陆续添设了“外国史志”课程，增加了世界历史知识的教学内容。在世界历史教科书的选定上，《万国史记》都成为首选。④

20 世纪史学家齐思和的《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》曾言，《万国史记》风行一时，读书人大概人手一编。⑤ 现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思勉说，11 岁（1894 年）时读了邹沅帆的《五洲列国志》、冈本监辅的《万国史记》才开始对世界史略有所知。20 世纪疑古派史学代表顾颉刚称，6 岁（1898 年）时，随意翻阅父亲带回的《万国史记》、《泰西新史揽要》、《万国演义》等书，懂得了一些世界史地知识。⑥《万国史记》传入中国之后，究竟有多少人阅读过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它确实深刻影响了清末知识界的阅读视野和学人的知识结构。

1901 年，清末新政进行学制改革，世界历史课程正式纳入中等高等学校的教育系统。由于世界历史书籍适合作为教材应用者非常有限，清廷规定，“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”。⑦《万国史记》又成为“应急用”的世界历史教科书。

由上文所述，可以归结出冈本监辅编著的《万国史记》传入中国后，立刻引起了清末中国知识界的关注，在新式学堂、传统书院中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利用和传播。该书体现出的西方史观及明治时代日本人的世界观念，对于清末中国人认识世界进而认识中国的世界定位提供了一种参照。《万国史记》在清末中国的介绍与传播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，也给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结构变革吹进了一股思变之风。

---

① 郑观应：《弭兵》，收入《盛世危言》，华夏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504 页。

② 张元济：《答友人问学堂事书》，收入《张元济诗文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6 年，第 172 页。

③ 王艳娟：《试论清末民初世界历史知识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》，《历史教学问题》2008 年第 5 期。

④ 王艳娟：《迎拒之间的选择：清末科举改试策论与西史接引》，《甘肃社会科学》2015 年第 3 期。

⑤ 齐思和：《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》，《燕京社会科学》1949 年第 2 期。

⑥ 李洪岩：《中国史学的近代化》，《学术研究》1999 年第 4 期。

⑦ 《奏定中学堂章程》，收入舒新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（中），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1 年，第 508 页。